

农民工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特点研究

——两代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

丁吉红 赵文进 周爱保

摘要：本研究从内隐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农民工的攻击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内隐攻击性用 IAT 测量，外显攻击性用自陈量表测量。研究表明：(1) 两代农民工身上都存在明显的内隐攻击行为，且老一代农民工的攻击性在内隐层面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强。(2)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攻击问卷四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3) 在两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中言语攻击是一个“中介变量”，外显攻击性的其它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的影响是通过言语攻击而产生的。

关键词：攻击性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内隐社会认知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致使城乡差别进一步凸现。抱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那些不仅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渴望融入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大量流入城市。据国务院研究室 2006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28.16 岁，全国大约有 2.1 亿农民工，其中第二代农民工约有 1.2 亿之多，35 岁以下的第二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但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艰难，他们在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滋生出的违法犯罪问题也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物，成为当前社会新的隐忧。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2008 年，农民（主要是 35 岁以下的农民工）犯罪人数达到 52.96 万，占生效判决罪犯总人数的 52.15%，自 2004 年来农民工犯罪年平均递增 41.88%。据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整个上海市犯罪总人数的 50% 以上，在广州则高达 80%，深圳竟高达 97%。即使在内地大城市如成都，近年来由流动人口引发的刑事案件一直占犯罪总人数的 83% 以上（周东平，2004：80）。在整个流动人口犯罪中第二代农民工犯罪占到绝大部分，他们已经成为实施违法犯罪的高危群体。

农民工的犯罪行为对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国外研究表明，个体早期的攻击性是成人期暴力犯罪较好的预测指标（Elley, 2001）。故本研究从农民工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方面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角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探究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深层原因，以期对缓解两代农民工高犯罪率的现状提供依据；探讨在什么情况下农民工攻击行为会消失，什么情况下农民工攻击行为会助长，从而为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中农民工攻击行为提供策略和犯罪问题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攻击行为的社会认知

攻击性是人发起攻击的心理特征，即人格中所具有的产生攻击的内在可能性。攻击性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并获得后天发展的一种心理本能。如果它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和宣泄，就会向外表现出破坏性行为——攻击行为（朱智贤，1989：236-238）。

为了更精确地描述和细致地研究，心理学家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攻击行为划分为不同的种

类。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哈特普（Hartup, 1974）根据行为者的动机将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敌意性攻击是以打击、伤害他人为根本目的的；而工具性攻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给被攻击者造成身心伤害，而是把攻击当作一种工具或手段以达到攻击之外的其他目的，如获得物质利益等。这一分类以行为的目标指向为根据进行划分有较好的信度，但其效度难以保证，因为很多行为的目标指向并非单一的，有可能是两种动机交织在一起，不分主次。

道奇和高尔（Dodge & Coie, 1987）根据行为的诱因将攻击行为分为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是受到他人攻击或激惹的情境下作出的攻击行为反应，主要表现为愤怒或失去控制等；主动性攻击则是指在受到攻击威胁或激惹的情境下主动为了某种目的而发起的攻击行为，主要表现为抢夺物品、欺负或控制他人等。这类既考虑到与行为相联系的情绪唤醒状况，又强调了行为发生的起因，在实际观察评判中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根据行为的表现方式，可以将攻击行为分为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黄希庭, 2002: 531）。言语攻击是指用口舌、语言、文字或表情对他人进行的攻击行为，例如辱骂、诬陷、诽谤、伪证等。身体攻击指用身体的某些部位如手、脚或用武器对他人的攻击行为，例如打人、斗殴、强奸或抢夺他人物品等。

国内最早进行这方面工作的是安德鲁陈（Shium Andrew Chen）和杨治良等用直接的再认测验与间接的偏好测验的任务分离范式，采用非参数统计的信号检测论方法求出辨别率和偏好率，对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发现被试对攻击者的辨别率明显高于被攻击者，并更偏好攻击者。证明内隐记忆的方法也可用来研究内隐社会认知，并指出攻击性具有内隐的特征，使我们对攻击性行为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Shium Andrew Chen、杨治良, 1996: 75 - 79）。

接着杨治良等用本科生为被试，以攻击性图片为学习和测验材料，采用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三种不同加工类型对再认和偏好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对攻击者的偏好率明显高于被攻击者，并证明内隐态度是可以测量的，且明显影响被试的社会判断（杨治良等, 1997: 17 - 21）。后有学者用内隐记忆的加工分离方法对内隐社会认知进行了系列研究，均揭示了社会认知也存在着启动效应。

高桦用图片投射测验，考察了罪犯的攻击性内隐心理特征。此外，他还在对常规的情境测验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用情境测验的方法考察了人在受挫情境下的直接攻击、间接攻击、自责、移情、压抑等五种反应方式。结果发现直接攻击在内隐状态下表现突出，在外显状态下较弱（高桦, 2000: 5）。学者们也考察了不同性别的被试在再认与偏好测验中对攻击性图片所表现出的各种异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对内隐和外显社会认知有不同影响，即出现了实验性分离；男女被试均偏好攻击者，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还有研究者采用偏好判断法探讨了不同属性的刺激物对不同性别内隐攻击性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刺激物的属性设计为被攻击者是女性时，在内隐攻击性上存在性别差异，反之则不存在差异（叶茂林, 2004: 334 - 336）。

叶茂林于2001年首次以初中学生为被试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在未成年人身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内隐攻击性（叶茂林, 2001: 418 - 422）。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内隐攻击性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朱婵媚等还对未成年人内隐攻击性的形式进行了研究，得到结果：未成年人对身体攻击词的偏好显著高于语言攻击词，表明个体更具有身体攻击的倾向性（朱婵媚等, 2006: 48 - 50）。

最近，研究者的视野开始从基础的实验性研究向影响个体内隐攻击性的相关因素研究上转移。陈欣等将父母教养方式与内隐攻击性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态度和行为不仅对儿童的外显攻击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内隐攻击性产生影响，内隐攻击性与父亲的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母亲的惩罚严厉等3个因子有显著正相关（陈欣、杜建政, 2006: 798 - 801）。崔丽娟等还对网络游戏成瘾者的内隐攻击性进行了研究，发现网络游戏成瘾者与非网络游戏成瘾者相比，虽然在外显攻击性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是网络游戏成瘾者持有自我攻击性信念和对攻击性的更为积极的内隐态度（崔丽娟等, 2006: 570 - 573）。徐德森的学

生内隐攻击性表现方式的性别差异实验研究,发现内隐攻击性在表现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与身体攻击联系更紧密;女性与言语攻击联系更紧密(徐德森,2007:22-23)。高雯等运用道德领域理论来解释SIP模型中的数据库及其对信息加工的影响,说明了社会知识和经验是相互联系、紧密组织的,至少体现在信息加工的提取过程中,初步改变了以往潜在心理结构组织松散和研究独立的理论局面,是道德发展研究与攻击性研究一次有意义的整合尝试(高雯、陈会昌,2008:91-97)。

(二) 农民工问题介绍

据各地公安机关的统计显示,在城市的刑事犯罪中,外来人口占60%以上,这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0年以来,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广东达到了60%以上,而“两抢”的犯罪嫌疑人也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周沃欢,2002)。

以广州市为例,调查表明:农民工作案被抓获的占全部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比重近年来不断增加,由1995年的70%左右到2001年的80%左右,而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即本文所说的农民工。^①其他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情况大体类似。福州市外来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它们基本可以反映农民工犯罪的特点。

从数量上看,非职业化外来犯罪人员是外来人口犯罪的主力军。据北京市东城区统计,在抓获的入室盗窃的外来人口中,18%是有前科劣迹或负案在逃的;24.4%是盲目来京打工未成的;59%是嫌打工挣钱少的,其中19.7%是打工间歇进行入室盗窃的(王世卿等,2003:18-20)。但这只是外来人口犯罪的表面现象。以进城务工实现做城市人理想的外来人口,是城市外来人口的主体,尽管他们工作艰苦,社会地位尚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多数人的行为基本合乎有关法律规范,已经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基本立下脚。这部分人一般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动机,而且其违法犯罪的成本也过高,所以其违法行为鲜有发生。统计学上占主要地位的外来人员的犯罪,基本上属于进城务工不成和建筑民工所为。这部分外来人员不仅违法行为多,而且由于是非职业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落后,逃避打击的能力差,被查获的机会多,所以在有关犯罪统计中往往高居榜首,给人以错觉。

从发展趋势来看,外来人口犯罪总体呈现加剧化。福州市公安机关破案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所占比例逐年递增。2003年占52.4%,2004年占52.6%,2005年占53.6%,2006年占59.9%。由于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其犯罪案件较常住人口的侦破难度更大,抓获率更低,因此实际上外来人口犯罪的严重性,要高于破案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陈金友、林怡,2008:76-79)。

从动机来看,外来人口犯罪以侵财为主,其中盗窃居多。200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抓获8462名外来犯罪嫌疑人,涉嫌侵犯财产的占53.2%,其中涉嫌盗窃的占总数的33.2%。

从手段来看,外来人口犯罪地域性、专业性、暴力性较为明显。外来人口犯罪常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结成团伙,师傅带徒弟或相互传授“经验”,呈特定的地域性、专业性。作案手段暴力特征明显,不计后果。200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抓获的杀人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口占59.5%。

从目标来看,外来人口犯罪随机性、突发性较强。外来犯罪嫌疑人跨市、县流窜作案,往往自认为即使被受害人、周边人员看见,也不易被查明身份或被抓获,所以一有机会便作案。在选择侵害目标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从成员来看,年轻人犯罪较为突出。200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抓获的外来犯罪嫌疑人中,18~25岁的3339人,占39.5%;14~17岁的1415人,占16.7%。两者合占56.2%。此外,还存在农民工聚众打架、起哄闹事、故意毁坏公共设施等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以及不遵守城市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等问题。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主题。但攻击性行为却给人类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带来了威胁。2001年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一项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的

^① 能够找到工作,他们就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是剩余劳动力、流民(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2003:16)。

犯罪数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许多政府控制犯罪的能力”(潘绮敏,2005:3-5)。

三、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与测量

攻击性和攻击行为。攻击性是人引发起攻击行为的心理特征,即人格中所具有的产生攻击的内在可能性。对于人类,攻击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现象,攻击性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与束缚,就会表现出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攻击行为。

本研究对攻击的界定是:攻击是意在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言语,如杀人、殴打他人、散布谣言等均属于攻击。首先,攻击不只是一种情绪或动机,而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可以是肉体的,如用拳头、牙齿、武器或是言词攻击他人。攻击也可以采取各种间接的形式如传播恶意的中伤、间接捣毁别人的财产甚至伤害别人喜爱的东西。其次,攻击是攻击者企图伤害被攻击者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伤害他人,即包含企图伤害的动机,虽然攻击动机不能直接观察到。最后,攻击是攻击者在行动上伤害被攻击者,而被攻击者是不愿受此伤害的。因此本研究中的攻击等同于攻击行为。

本研究期望通过内隐联想测验来检验是否老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内隐层面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存在对攻击性更强的偏好,这种偏好和以往对攻击性的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是否具有相似的特点,同时它与自陈式量表所测量的外显攻击性之间是否属于同一种心理结构。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1. 样本

数据来自于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2008 年 7-8 月分层随机抽取宁夏和甘肃两省建筑业、服务业、保险业、个体户、工人共计 200 人进行的内隐联想测验和问卷调查。有效数据 164 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 79 人,老一代农民工 85 人。所有被试要求学历在三年级以上,对内隐联想测验均非常陌生,同时自愿参加实验。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经过训练能较为熟练地操作计算机。

考虑到宁夏和甘肃两省地方语言的多样性,主试均来自宁夏和甘肃两省的研究生,使用地方方言进行测试。

2. 实验材料

(1)内隐联想测验

目标概念包括具有攻击性和被攻击性的词。

代表攻击性的词:打倒、冲撞、殴打、辱骂、侮辱、讽刺、打架

代表被攻击性的词:躲避、忍耐、退让、逃跑、挨打、哭泣、挨骂

属性概念包括积极性词汇与消极性词汇。

积极情性词汇:聪明、健康、能干、灵活、整洁、大方、宽容

消极情性词汇:愚蠢、可恨、小气、软弱、自卑、讨厌、难受

(2)攻击性的自陈式量表

BDHI 敌意调查表(Buss - 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简称 BDHI),巴斯和德基在 1957 年编制的自我报告攻击性测验,共 24 个项目,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为五个等级。经过修订,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57-0.83,重测信度 0.78(Ronald Blackburn,2000:264)。

采用翻译阿诺德·巴斯和马克·佩里在 1992 编制的攻击性问卷(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简称 AQ(Buss,1992:452-459)。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修订后为 0.55-0.94,重测信度 0.810。

四、结果与发现

(一) 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内隐攻击性测验结果

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内隐攻击性测量结果做 T 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两种联合任务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82, p < 0.01$);老一代农民工在两种联合任务上存在显著的差异($t = -2.09, p < 0.05$),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不相容联合的反应时都明显低于相容联合的反应时,且新生代农民工的两种联合任务的反应时都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说明两代农民工身上都存在内隐攻击行为,且新生代农民工的攻击行为比老一代弱。结果见表 1:

表 1 两代农民工的内隐测量结果(单位:ms)

	不相容联合(M ± SD)	相容联合(M ± SD)	t	p
新生代	1789.47 ± 729.36	1465.37 ± 401.52	-2.82 * *	0.007
老一代	1791.19 ± 677.85	1559.33 ± 471.87	-2.09 *	0.040

注: 表示 $p < 0.05$, * * 表示 $p < 0.01$, * * * 表示 $p < 0.001$,以下同。

(二) 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外显攻击性测验结果

由表 2 可以看出,对于攻击问卷总分,两代农民工在敌意总、攻击总、愤怒、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敌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说明两代农民工身上都不存在外显攻击行为。

表 2 两代农民工对攻击性问卷总分的方差分析

变 量	SS	df	MS	F
敌意总	2150.516	23	93.501	1.029
攻击总	4275.536	23	185.893	0.988
愤 怒	642.503	23	27.935	0.977
身体攻击	622.311	23	27.057	0.817
言语攻击	310.808	23	13.513	1.562
敌 意	612.860	23	26.646	1.535

(三) 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和外显攻击性特征与其他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外显攻击性各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D 值)影响作用的大小,以外显攻击性各因子为预测变量,即愤怒因子、身体攻击因子、言语攻击因子、敌意因子,内隐攻击性结果(D 值)为因变量,使用多重路径分析构建它们之间的网络因果模型。

从图 1 可以看出,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外显攻击性各因子与内隐攻击性结果(D 值)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由图 1 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在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结果影响(D 值)有四条显著路径:一为敌意→愤怒→身体攻击→言语攻击→D 值;二为敌意→言语攻击→D 值;三为身体攻击→言语攻击→D 值;四为言语攻击→D 值。所以对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中言语攻击是一个“中介变量”,外显攻击性其它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的影响是通过言语攻击而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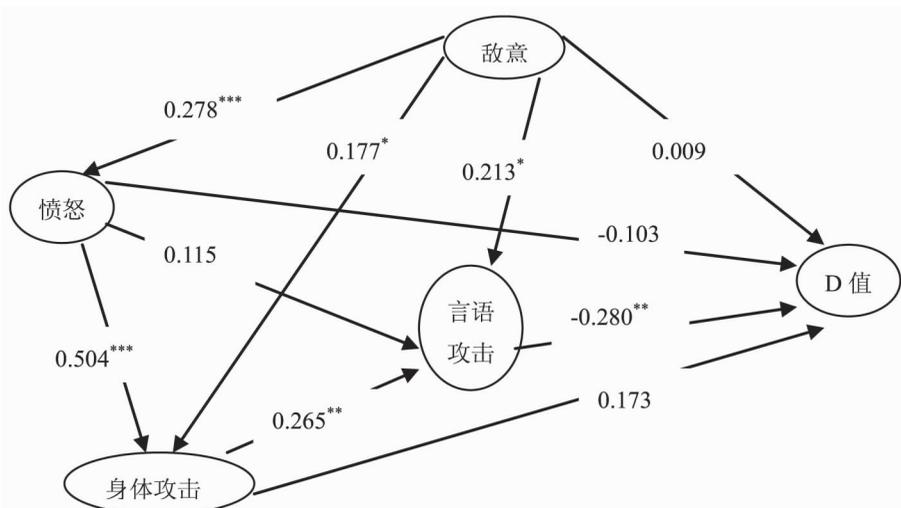


图1 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外显攻击性特征与其他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宁夏和甘肃农民工做了内隐联想测验和问卷调查,对两代农民工攻击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有些结论还值得深入讨论。

(一)从挫折—攻击理论探讨两代农民工内隐攻击行为

挫折—攻击假说认为个体的攻击不是来源于本能,而是外界刺激引发的内部驱动所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挫折—攻击理论。攻击总是挫折的结果,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前提,而且挫折的存在总是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他们认为,攻击只有一个起因—挫折,挫折只有一个反应—攻击。1989年伦纳德·伯克威茨(Leonard Berkowitz, 1988: 186)在原理论之上提出了新的看法,挫折引起我们的攻击行为是因为挫折令人厌恶,使我们受挫的事情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当我们以攻击作为对挫折环境的反应时,我们其实是对不愉快事情作出反应。

而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两种联合任务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82, p < 0.01$);老一代农民工在两种联合任务上存在显著的差异($t = -2.09, p < 0.05$),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不相容联合的反应时都明显低于相容联合的反应时,且新生代农民工的两种联合任务的反应时都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身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内隐攻击性,且老一代农民工比新一代农民工内隐攻击性强。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习惯、价值观、社会声誉等因素选择的比例更大,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所谓的“农民工”,而是一个很有可能融入城市的“未来城里人”(魏晨, 2006: 107 - 109)。所以,他们开始更多地注重自己与城里人在生活习惯等社会性因素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收入。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与城市居民之间交往频率的增多以及交往的加深,对城市居民的印象比老一代要温和。

由于老一代农民工在大量涌入城市的时候给城市的交通、治安、卫生环境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导致了市民对农民工的抱怨和歧视,而且老一代农民工多集中在建筑行业,很容易在城市居民的想象中转化为城市居民难以接受的形象——不讲卫生、不讲礼貌、野蛮、具有危险性等等。因此,在这样的现实中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歧视;而对新生代而言,尽管他们在进城之初就因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而被固定在了受歧视的位置上,但他们从事的行业与老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集中在建筑行业,而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网、听音乐、买时髦衣服、用电子产品,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与城市居民一样,受到的歧

视也相对少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显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城市性。他们在进入城市以后,由于职业的改变与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观、社会关系等。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方面是由其年龄特征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不断改变的结果之一。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们与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交往频率也会因此增多,有了更多的与城市居民深度交往的机会,融入城市的可能性也更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有着更强烈的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意愿,并且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或其他联系与城市居民有了深度的交往,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频率更高。通过双方的互动,他们对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与城市居民处于整体隔离状态;通过互动,他们对城市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很多与农村居民不同的观点、态度。实际上,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城市居民形成了密切关系。

以上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内隐测验中两代农民工攻击性都比较强并且新生代农民工攻击性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

(二)从内隐和外显心理结构间的关系解释两代农民工外显攻击行为

内隐测量与量表测量由于测试方法的不同,其结果也是对人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不同表达。对于自陈式量表测量,被试有较为充分的时间与充足的精力来检测自己的外显态度,虽然内隐态度也被自动激活,但由于它与外界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受到理性的压抑而降低强度,因此外显态度将更多的控制人在测量中的反应。在内隐测量中,由于要求被试尽快完成任务,而且并没有直接问被试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因此被试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检索他们的外显态度,他们的反应更多地受到被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的控制。对于攻击性,显然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强调以德服人的环境中攻击性更易被视为一种对道德、法律的违反。因此尽管在两个测验中都得到了激活,但在量表测验中,更多地受到了外显态度的干扰而难于表现出来。不同的是在内隐测量中,由于被试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检索外显态度,因此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的偏爱。

本研究发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在敌意总、攻击总、愤怒、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敌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说明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都没有外显攻击行为。

以上内隐和外显心理结构间的关系说明了两代农民工的攻击行为在内隐测验中有差异,而在外显测验中没有差异的原因。

(三)言语攻击——两代农民工攻击的主要诱因

攻击的诱发因素多种多样,但言语攻击是主要的诱因。可能是由于沟通上的障碍,如因为交际中的信息传递失真、信息量不足、文化冲突、认知结构的不对等导致的。每个人对问题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不同行为方式的人在一起交往自然会引起摩擦和碰撞,当对对方的不满情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言语攻击就会发生;攻击还可能由于需求和利益的不满足造成的。在人际交往中,任何层次需求的不满足都可能导致攻击的实施,而且,人对于某种需求的期望强度和水平越高,对于不能满足需求而引起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攻击实施的强度也越高。

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纷繁复杂,人与人之间有时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交际关系,有时也会由于种种摩擦和矛盾而产生一些不和谐的音符,造成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有时会因为当事人的修养、气度或利害因素的制约而缓解或消除,但更多的是引起程度不同的攻击行为,如相互间的批评、争吵、谩骂、诋毁、拳脚相加、甚至是战争等,其中以言语作为攻击的手段是人际交往中最常见、最普遍的一种攻击行为。

这也许能解释农民工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中言语攻击是一个“中介变量”,外显攻击性其它因子对内隐攻击性结果的影响是通过言语攻击而产生的。

构建和谐社会的焦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民进城务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伴随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谋生,他们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滋生出的犯罪问题也成为构建

和谐社会的伴生物,成为构建和谐不和谐的因素。当这个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被忽视,他们早晚会将受到的伤害和不平等以各种方式向社会表达,不合法的、不道德的表达方式必然要给予我们的社会以伤害。特别是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攻击行为走向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时,这种报复和犯罪对我们和我们的社会的伤害就更为惨烈。这种状况的出现已经成为解决构建和谐和谐社会进程中“三农”问题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本研究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都存在攻击行为,希望能为解决构建和谐和谐社会中农民工攻击行为提供策略和犯罪问题提供参考,从而在准确认识的基础上,为宁夏和甘肃未来农民工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找准落脚点。

参考文献:

- 陈金友、林怡,2008,《福州市农民工犯罪社会原因探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11期。
- 陈欣、杜建政,2006,《父母教养方式与内隐攻击性的关系研究》,《心理科学》第4期。
- 崔丽娟、胡海龙、吴明证、解春玲,2006,《网络游戏成瘾者的内隐攻击性研究》,《心理科学》第3期。
- 高桦,2000,《内隐社会认知:攻击性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高雯、陈会昌,2008,《攻击行为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与道德领域理论的整合》,《心理科学进展》第1期。
- 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2003,《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黄希庭,2002,《人格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 伦纳德·伯克威茨,1998,《社会心理学》,张需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 潘绮敏,2005,《青少年攻击性的维度结构及其相关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Shuim Andrew Chen、杨治良、刘素珍,1996,《“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第1期。
- 王世卿、李伟清,2003,《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特征》,《犯罪与改造研究》第3期。
- 魏晨,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第4期。
- R. 布来克本,2000,《犯罪行为心理学》,吴宗宪、刘邦惠等译,中国轻工出版社。
- 徐德森,2007,《大学生内隐攻击性表现方式的性别差异实验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杨治良、刘素珍、钟毅平、高桦、唐永明,1997,《内隐社会认知的初步实验研究》,《心理学报》第1期。
- 叶茂林,2001,《材料性质与内隐攻击性启动效应的实验研究》,《心理科学》第4期。
- 叶茂林,2004,《刺激物属性与内隐攻击性的性别差异》,《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报》第2期。
- 周东平,2004,《犯罪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 周沃欢,2002,《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社会心理学的实证分析》,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 朱婵娟、宫火良、郑希付,2006,《未成年人内隐攻击性特征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探新》第2期。
- 朱智贤,1989,《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Buss, A. H. & Perry, M. 1992,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63
- Elley, Nida Lie, 2001, “Detector & detectio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Psychology Today*, Vol.34(5)

作者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
责任编辑:李春玲